

《刊叢學哲化文》

# 學號符化文

著程鵬龔



行印局書生學灣臺

龔鵬程著

文化符號學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文化符號學／龔鵬程著.--初版.--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  
民81

面： 公分.--（文化哲學叢刊；6）

ISBN 957-15-0402-5（精裝）.--ISBN 957-15  
-0403-3（平裝）

1. 中國語言-哲學，原理
2. 中國文學-哲學，原理
3. 中國-文化-哲學，原理

802.01

81003683

文化符號學（全一冊）

著者：龔鵬程
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發行人：丁文生
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：00024688

電話：三六六三三六

FAX：三六六三三六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

印刷所：常新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板橋市翠華街8巷13號

電話：九五二四二九·九五三一六八八

香港總經銷：藝文圖書公司

地址：九龍偉業街99號連順大厦五字樓及七字樓

電話：七九五九五九九五

定價 精裝新臺幣四二〇元  
平裝新臺幣三六〇元

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初版

11908

究必印翻·有所權版

ISBN 957-15-0402-5（精裝）  
ISBN 957-15-0403-3（平裝）

## 自 序

這部書稿，旨在觀察中國的文學與社會文化，且每篇文章都使用著由語言文字符號去了解文化的方法。全書也旨在指出：構成中國文化的整個社會生活領域，事實上都處在中國文字符號系統的組織和制約中。因此，友人蔡英俊建議我將此書命名為「文化符號學」。

我知道他擬想此名稱時，是從近代西方學術發展史上得到靈感的。因為這種文化符號學的方法，一般以為肇端於維柯的《新科學》。

維柯認為：人類認識中所謂的真實，其實是他通過自己的觀念和語言所構造的一種真實。故古人之神話，乃以隱喻之方式去描述其所見之世界。這些神話不應看成是古人荒唐無稽或原始落後的徵象，而應視為古人運用隱喻思維（或稱詩性思維）所建立之符號系統。此說不僅指出了研究神話的方法，更動搖了我們對語文的一般見解。一般人總把語言文字視如斧頭鉗子般的工具。但維柯以後的語言哲學，却覺得語文不只是工具。人必須透過語文方能論述這個世界；不同的語文傳統，所理解和敘述的世界即不相同。因此，語文提供了人類認知與解釋世界的基本範疇，也影響到人類所有的思維與文化表現。我們所身處的世界，乃是我

們自己運用語文構成的世界。故只有深入解釋語文，方能解釋社會。這種新的見解，影響深遠，在近代西方學術發展史上，早已非一家一派之私見，而是一種廣泛的學術傾向了。所以語言研究，不僅為當代諸多哲學課題之一，它已成爲哲學的基礎、方法，並具有近乎傳統哲學中形上學的地位了。

我的研究，在方法和趨向上，與上述西方近代學術之發展有並駕對觀的意味，故將本書名爲文化符號學，甚爲恰當。但我之爲此，有特殊的感懷，手眼心力，頗不同於西洋符號學的傳統，似應再予說明。

案，符號學，旨在討論人類運用符號之方法與過程、符號的性質及其指涉等問題。舉凡語言、文字、聾啞者之手式、電報、旗語、音樂、宗教儀式、祭典、服飾、親屬系聯……等符號系統，皆在其討論項目之列。或稱爲記號學、或名曰形名學。由於人類所使用的符號系統，以「語言」最複雜、最完整，故符號學的研究，實以語言學爲根本基石。透過對語言的研究，形成一些基本觀念，再推拓及於其他符號系統，逐步建立一個討論一般符號的理論體系，用以分析人類各種符號之構成與運作。

這種學問，若放在中國的學術脈絡中說，則當稱爲「名學」。

正名，雖然是先秦諸子共同的主張；建構成爲一門學問，專門探討名的性質、指涉及使用狀況，則有名家一派學者專門致力於此。名家對名的辨析，後來因太過繁瑣而遭到攻擊，謂其「碎義逃難，致遠恐泥」，故漸趨式微。到了清朝末年，學人身當時世之變，遂扇揚古風、會通西法，名學之義，乃復炳炳烺烺焉。然而揆測其論述之途，蓋有三類：

第一種路向，是依西洋的文法語法之學來重建名學。亦即把名學視爲建立語言規則系統

的學問。代表著作是馬建忠的《馬氏文通》。循著這個路向，近代的中國語言學、語法研究，於焉展開。與西方自索緒爾以下之語言學傳統也能直接聯結起來。專門名家，如黎錦熙、陳望道、王力、許世瑛、張世祿、周法高……等，著作宏富，已建立了不可動搖的學科新傳統。

第二種路向，是依西洋哲學與邏輯研究之規模，來重建名學。亦即把名學視為主智的邏輯的心靈表現，認為墨家之墨辯，名家之惠施、公孫龍、鄒析，皆具有「純理論的興趣」（馮友蘭語），乃「一系相承之邏輯心靈之發展」（牟宗三語），試圖用歐西邏輯語式，來重新詮解名墨舊文。代表人物是胡適、牟宗三等。循著這個路向，近代講中國哲學史者，亦能與西洋哲學在近代重視語言研究的發展相關聯起來。

第三種路向，是對中國傳統文字訓詁之學的發揚與重構。如劉師培、章太炎諸氏之論正名，皆紹承清儒詁經之學，兼採西洋語言學知識，予以系統化條理化。但這條途向，後來又分化為兩路，一是重回清代訓詁小學的格局，另一路則匯入依西方語言學語法研究而構建的語言學陣營中去了。

這些途向，甚為不同，各路向內部亦有嚴重之分歧，不同路數間彼此更是互相攻訐。我入大學時，所讀淡江大學中文系，是許世瑛先生創辦的。許先生無疑為第一種路向在台灣之代表人，系中師友濡染宗風，從事語法研究者甚多。後負笈師大國文研究所，林尹、高明諸先生，師承章太炎一派，以訓詁小學為主，耳目心力所及，端在《說文》與《廣韻》。此近代名學發展之第三種途徑，而退返於清儒故墟者也。故彼時林先生等，皆頗以能紹清儒箕裘自矜，自謂為俞樾、孫詒讓、章太炎、黃侃之嫡傳。當時台大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諸先生亦好言語言研究，然自董同龢以降，取徑皆與師大一派不同。偶相談論，輒為雙方之刺悖不相

入所驚。而世之治哲學者，又對中文系之硜硜然於文字語言，頗有微辭。新儒家如牟宗三等，尤其鄙視師大的小學傳統。我與新儒家一派過從論學，本極熟稔。對於兩派的衝突，感觸當然也很深。而當時却又有不滿於新儒家者，頗採摭邏輯實證論之話頭，自謂沿續殷海光之教，以台大哲學系爲主。双方腹誹面諍，亦頗嚴重。其時我尙未能辨章學術之源流，遂以爲此乃人事恩怨、派系糾紛使然。至今則逐漸明白這可能恰好顯示了近代名學的幾種不同發展。

而且這幾種發展之所以互相譏詆，彼此不協，固由路線不同所致，實亦肇因於它們自身皆存在著甚多疑難。

例如依西洋文法語法研究而建立的語言學，事實上已使漢語語法的詞、詞類、句子、主語、賓語等基本範疇，歷經幾十年論爭仍無法獲得合理的解釋。正如張世祿〈關於漢語的語法體系問題〉一文所說：「漢語語法學的建立，從開始到現在，已經快要一個世紀了。在這八九十年中間，研究和學習漢語語法的，幾乎全部抄襲西洋語法學的理论，或者以西洋語言的語法體系做基礎來建立漢語的語法體系」，以致在詞類、結構形式、句子類型這三方面的洋框框，「好像是三條繩索，捆著本世紀的漢語語法學，使它向著複雜畸型的方面發展」（一九八〇·復旦大學學報）。

所謂走入畸型複雜的死衚衕，乃是指此種研究根本無法處理漢語的特殊語言現象，也無法通過這樣的研究，建立一個語言學理論的規模。而且，在西方，語法研究，向來可以直接關聯於其形式邏輯之傳統，因此，語言學可以跟哲學研究、文學批評密切聯結起來，成爲哲學解析和文學評論的基本方法，我們的語法分析却僅僅是語言學中之一支，完全無法延伸到邏輯思維的討論上去，與文學研究亦無甚關係。

另一路語言學的發展，如章太炎所代表者，主要是傳統聲韻文字訓詁之學的發揚，故其病不如前述之甚，但他們對西學也非無所因仍參考。像章太炎的「小學」，特點正在於對聲音的強調。他批判古代的小學「專引筆畫，繳繞文字」「刻削字形，不求聲音」。所以他要「作《文始》以明語原，述《新方言》以一萌俗」。換言之，他扭轉了傳統以文字為中心的小學（所謂「保氏教國子以六書」），從語言上去掌握文字。例如由語言之緣起，說明「同一聲類之字，其義往往相似」；謂轉注之「建類一首，同意相受」，類指聲類，首指語基；並由聲之轉變，來解釋何謂轉注、何謂假借、何謂遞衍等等，皆與漢宋明清人言小學者大異其趣。他講聲類、講語基、講聲音，試繙其《國故論衡》上卷小學十篇（小學略說、成韻圖、一字重音說、古今音損益說、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、古双聲說、語言緣起說、轉注假借說、理惑論、正言論），便知其所謂小學，乃是語音為樞紐的。是通過對語言變遷的了解，來掌握文字孳乳發展的脈絡。此非通達西方語言學，絕不能有此觀念，亦不能有此術語。黃侃作《國故論衡贊》云：「侃以頑質，獲侍君子，嘗聞文字之本，肇於語言，形體保神，聲韻是則。曉微摛約，獨能尋理。若夫探蹟索隱，妙達神指：聲有對轉，故重文孳多；言無定型，而轉注斯起。其猶二君所未逮乎！」正指此而言。

但反傳統者往往因為必須自附於傳統，故可能以新觀點去錯釋傳統，而又因他們自稱是傳統之發展，遂使後學者忘記了他們本來是反傳統的，反而以保衛傳統的方式來紹述他們。如章太炎《文始·略例·庚》謂宋朝王聖美之右文說，是「字從某聲，便得某意」。劉師培《字義起於字音說》更推溯於晉朝，云：「字義起於字音，楊泉《物理論》述取字，已著其端」。其實，據《藝文類聚》人部引楊泉之說，乃「在金曰堅，在草木曰緊，在人曰賢」，



是就會意之關係說，而非由聲音論字義起於音。王聖美的右文說，更與字音無涉，沈括《筆談》卷十四謂：「王聖美治字學，演其義以爲右文。古之字書，皆從左文，凡字，其類在左，其義在右，如木類，其左皆從木。所謂右文者，如𣎵，小也。水之小者曰淺、金之小者曰錢、歹而小者曰殘、見之小者曰賤，如此之類，皆以𣎵爲義也」，故所謂右文，是說字義往往可以從字的右偏旁得知，根本不會談到什麼「字從某聲，便得某義」。章太炎劉師培自己主張因聲求義、主張因聲言之變以考文字之孳乳，遂不免錯述宗枋，推源於古人。否則豈能將古代以會意爲主的文字學，扭轉成以形聲爲主的文字學？所以這是總體文字學觀念的轉變以及方法的更新。固然盡章劉之術，未必便真能如章氏所期許的那樣，「衡論國故、平章王教」，然而學者循其塗向，自可生面別開，另樹新幟。無奈繼承者墨守師說，竟真以爲章劉所說即是清儒詁經之法、即是清人小學之故轍，嫡傳正宗，莫可移易。於是一種生猛有力的語言文字學之革新運動，漸漸地竟退返於《說文》的條例分析、以及聲紐新變之爭論之中，看不出具有什麼革命性意義。而章太炎當時以發揚古代名學爲職志的豪語：「小學者，國故之本，王教之端」，亦淒然而墮落成一工具性的入門學科、或獨立分析文字音義而與其他學問渺不相干之術。

講中國哲學史的先生們，對此學風，夙致不滿。然以宋明理學來反對那些標榜漢學清學者，實亦爲其表象所誤，且夾纏於漢宋之爭的歷史陰霾中，未能得其總理。將名家之學，類比於邏輯問題，更是大錯。故其論述墨辨名學之結果，並未如近代西洋哲學那樣，將語言分析提升到一個方法學的層次；也未能理解到名學在中國學術文化中的地位。他們只是發潛德之幽光，表述了一些眾所遺忘的名家墨家舊論題，並用一個理論（如牟宗三的「兩層存有論」）

來安置它們和宋明理學的關係而已。

這三種途向都未必能為中國名學打開一條生路，我自己的研究也不從此處問津。我是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處理這一問題的。

文學批評本來就要討論到語文表現諸問題，早期王力《漢語詩律學》即對中國文學中的聲律問題頗有析釋。影響所及，在台如王忠林《中國文學之聲律研究》、邱燮友《唐詩中使用和送聲現象》之類論著，亦沈沈夥頤。除了這些文學聲律的研究之外，有些人透過修辭學，來討論文學作品中的字句安排，如黃永武《中國詩學》，剖析詩中的倒裝、實字、虛字、矛盾語法……等。有些則參酌西洋語法分析之技，撰為專文，如高友工、梅祖麟《唐詩的語法、用字與意象》、梅祖麟《文法與詩中的模稜》、李文彬《變換律語法理論與文學研究》等。顏元叔運用形式主義結構分析，講張力、反諷、字質，亦近於這一路。還有一些，則不從這些細碎局部的地方去談作品的文字技巧，而是從語言運用的整體性質上去討論文學，如王夢鷗《文學概論》《文藝美學》，即以「語言美學」的角度，認定文學就是語言的藝術；直述、譬喻和繼起意象，就是賦比興。

凡此皆可視為名學在文學批評上的表現，但亦不妨縱貫化，視為我個人的學思歷程。也就是說，在近二十年間，我亦嘗問塗於上述諸端。先熟稔傳統之詩詞曲律學，進而能以修辭學觀點去討論作品的文字構成，以窺作者鍊字鑄句之匠心所在。再進而參酌西方的新批評、形式主義、結構主義、敘事理論和當代漢語語言學，嘗試對中國文學有所解說，並企圖建立一個新的語言美學架構。步步運思，甘苦備嘗。

這樣的學思過程，使我在處理中國文學批評史時，特別注意到抒情主體之外的文學語文

表現諸問題。文體的規範與流變、文法的講究與發展、以及主體性情和文辭之間的辯證關係，皆曾耗我不少筆墨。凡所申議，具詳於《文學批評的視野》《文化文學與美學》等書。而在說明文學原理的拙著《文學散步》中，也想從語言構成方面來闡述文學的特質，並區分「意義形式」和「結構形式」，以解決長久以來的文學內容和形式之爭，建立一套新的文學美學。體系初具，綱維略張，差可以成一家之言矣。然而語文的研究似不應止於此。由語文意義的理解面看，涉及了詮釋與理解的問題；由語文做為一基本文化傳承中介者看，語文之使用與發展，本身便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問題。因此，通貫語文與文化之研究，乃是我不能規避的方

向。

針對這些問題，我一方面創辦《國文天地》月刊，討論語文與社會文化之關聯，一方面深入歷代文化史的研究。我的目的，是想說明中國語文與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內在聯繫。只有把這層關聯弄清楚了，我們才能明白中國文化之特質，以及中國文學藝術發展的原理。

到這個時候，我便發現原先依西方近代語言學符號學而說「語言構成」等等，是大成問題的。因為在我國，文字可能比語言更值得注意。中國之所謂名學，固然兼指文與言，然主要是指文字。故《論語·子路篇》：「必也正名乎」鄭《注》就說是：「謂正書字。古者曰名，今者曰字」，《儀禮·聘禮》的《疏》也說：「名者，即今之文字也」。所以現在若要談符號學，首先就必須注意近代西方符號學的語言學屬性，並予以扭轉。

在此，我擬岔開去，先介紹德希達 (Jacques Derrida) 的一篇訪談紀錄。那是他與克里斯特娃的對話：〈符號學與文字學〉。最初發表在一九六八年六月的《社會科學通訊》，中譯則刊於一九九二年一期《哲學譯叢》(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編，余碧平譯)。在該文中，

德希達認為：自索緒爾以降，皆將語言學當成符號學的一般模式。這種做法，顯露了西方傳統的語詞中心主義和語音中心主義態度，所以才會把文字視為語言的拙劣表現者。對這種態度，德希達甚不以為然。故主張以文字做為符號學最一般的概念，謂「這一概念的優點，就是在原則上中和符號的語言學傾向」，並可注意到「超出西方界限之外的文字之歷史和系統」。顯然，他是想用文字學來替代符號學，或替符號學重新界定意義與方法。因為唯有如此，他覺得才有可能打破「在場／不在場」「主體／對象」等所有西方傳統形上學的概念區分，超越一切以語詞為中心所構成的封閉狀態，扭轉從柏拉圖到黑格爾的傳統。

德希達的想法與做為，我以為它跟我有某種類似性。我當然不必如他那樣，力圖解構西方傳統，可是我注目於中國文化社會這個「超出西方界限之外的文字之歷史與系統」，自然就以為文字做為符號學最一般的概念。而且，我亦將如其解構理論，由文字符號指向文化傳統層面，進行文學與文化批評。亦即由文字，進而通貫文學與文化，一方面重構一個新的符號學規模，一方面則以此符號學來展開我對中國「文字、文學、文化」一體性結構的總體解釋。

因此，在本書中，我從文字的考察開始，分為三卷。上卷論文字、文學與文人：

中國文人傳統之形成：論作者

中國文學藝術發展的結構：說「文」解「字」

文字藝術中的辯證：由張懷瓘書論觀察

本卷先論我國文人傳統的形成、文學創作者的出現、以及文學批評的基本路向。再論文學與諸藝術間分合起伏之發展歷程，說明我國各種藝術如何文字化與文學化。而文字藝術

(書法)本身，却也存在著究竟要不要脫離文字而獨立發展其線條藝術的疑難，最後則以一種辯證的方式處理之。前兩部份，以理論綜述為主，後一部份係以唐朝張懷瓘的書法理論為例，即事言理。

第二卷則以文字為中心，觀察我國哲學、宗教等各方面的文化表現：

哲學文字學——中國哲學之主要方法與基本型態

有字天書——中國宗教(道教)的性質與方法

文史通義——中國史學對歷史寫作活動的思考

在哲學方面，我認為中國的思考，係以字為單位；解釋文字，乃我國哲學的主要方法與基本型態。而這一點，却與西方大異其趣。西洋哲學，是以分析句子為主的。例如從前馬克斯會經批評黑格爾：「黑格爾講『可是主觀性只是作為主體才真正存在，人格只是作為人才存在』。這也是神秘化。主觀性是主體的規定，人格是人的規定。而黑格爾不把主觀性和人格看成主體的謂語，反而把這些謂語弄成某種獨立的東西，然後神秘地把這些謂語變成謂語的主體」(《馬克斯恩格斯全集》·第一卷)。在這兒，顯然他就是想從主謂語構的句子分析來談問題。

這個例子，說明了西方思想家在要澄清觀念時，常會採用「重新分析句子」的辦法。把句子弄清楚，事實上也就把哲學問題解決了。近代語言分析哲學所強調的：「沒有哲學問題，只有語言問題」，即徹底揭露了這個意義與奧秘。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贊成分析哲學或邏輯經驗論，然而，分析語句仍可視為彼此共通的方法運作。

這些分析，正如斯特勞在《哲學中的變革》第七章〈構造與分析〉一文中所指出的，甚

爲分歧：「是要分析出它們是直陳式還是斷言式的句子嗎？還是要分析出這些句子所表達的思想或其陳述？」但不管如何，似乎分析的對象主要是命題，「一個句子，作爲一類屬於相同論題之句子的代表，據說可以通過另一個句子的構成而得到說明」。這在中國便否。例如王陽明論格物致知，他絕不會把格物致知視爲一命題，且以分析句子的辦法來說明其涵義。他只會解釋：「何謂格物？格者，正也」。這就是說文解字、深察名號的方法了。

對文字進行深入的省察，以明白萬事萬物的道理，既爲中國哲學之基本型態與方法，中國人當然就相信文字與真理是相關的。文字可以見道、道即在文字或道與文字相關聯，這是所有文學家都深信不疑的，但最深刻極至的表現，則在宗教。中國人特有的道教，事實上正是一種文字教。相傳古代醫術，有所謂「祝由科」者，云係黃帝所傳，故稱爲軒轅黃帝祝由科。乃黃帝仰觀俯察，利用文字、造爲秘字符章，「以尙字爲將、食字爲兵，各作爲先鋒，以作治病驅邪之用」（《黃帝碑記醫學祝由十三科·序》）。蓋即禱祝病由，以符治病者也。其法出於天師道，相傳迄今。這是道教符字妙用之一端，也最能顯示我們對文字神奇力量的信仰。與道教靈寶派所謂「無文不生，無文不度，無文不成，無文不立，無文不明，無文不光」相似，文字被視爲一切生成變化的樞紐與力量。故書寫文章，可以同時是一種文學活動，也是宗教行爲。

文學書寫活動不但關聯於道，關聯於宇宙秩序與終極真理，也關聯著歷史的開展。《王闖運年譜》卷二中有段記載很有意思，他認爲：「古今學術，約有三塗：一曰儒林、二曰文苑、三曰道學」，但「文苑之中復分三等，長記述者謂之良史。精論說者謂之諸子。工詞賦者謂之才人」。史著與論說並不被認爲不屬於文苑，這正是中國傳統的觀念。這裡最重要的

關鍵即在於：中國史學主要是對歷史寫作活動的表現與思考，因此它與文學本質上是一致的。章實齋撰《文史通義》，欲依此特性，建構一套文史學的規模，最能揭明這個奧秘。因此我在這兒即以該書為例，試由重新了解實齋文史學之體系與特色，來說明中國史學的精義。

第三卷繼續探索中國這個文字化的社會。第一章以唐代為例，描述我國社會中文學崇拜的現象。這個社會生活文學化、社會階層文士化、文學權威神秘化的社會，就是一個「文學社會」。在這一社會中，整個人文世界被理解為一以文字及文學所點染與規定的世界。文字與文學這一名言系統，既上通於道，又平舖展示為一社會名教系統，結構了社會的組織與人群關係、行爲、價值體系。這種社會之出現，當然突顯了中國文化的特點與精采，但這其中也蘊存了不少問題，第二章論儒學轉爲史學並出現文書政治，即略述此中之問題。第三章則由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文化的衝擊，來看這種文學社會如何瓦解或變遷。

對五四運動，我的觀感甚爲複雜，且有濃重的傷悼之情。因爲五四運動既已應舉發厲，歷史不會再走回頭路，中國社會文化的基本架構與文字傳統，可謂一去不可復返了。如何縫合歷史斷裂的傷痕，重新表述中國文化，乃我輩無可脫卸之職份。我自民國七十年起，佇思建構中國文化史學，後因力有不逮，僅成〈危機時代的中國文化史學〉〈觀乎人文：文化的形式與意義〉〈察於時變：中國文化史之分期〉三章而已。現在，我擬再由文化符號學這個角度來說明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，或亦可視爲另一種文化史學的表述罷！

總之，我在這本書裡，既想進行文化符號學這種方法論的創構，又欲運用此文化符號學之方法，來論析中國文化。既爲一文學研究，也是文字研究和文化研究。書中各篇獨立成文，而又交光互攝，相與補充發明，務求委曲盡致地說明中國文字文學文化一體結構之特性。論

旨龐雜、支蔓至多，殆與近日學界流行之風氣及論文規格未盡相符。然我之治史，自有一種文化的悲情在，欲求安身立命、繼往開來，不徒與時賢爭短長，故我用我法、自負生面別開。各篇舉例示意，輒欲為各研究領域闢榛蕪、啓新塗者，尙其餘事耳。這是我的心血所繫，當然有此自信。但目不見睫，恒人之蔽，尙祈海內賢達，賜匡不逮，無任感禱。時在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十五日，記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。



# 文化符號學 目次

自序..... I

## 第一卷 文字、文學與文人

第一章 中國文人傳統之形成：論作者..... 三

一、何謂作者..... 三

二、兩種作者觀..... 五

三、神聖性作者觀..... 八

四、作者之謂聖：孔子的地位..... 一二

五、述者之謂明：儒家的性格..... 一四

六、由述者到作者的轉換..... 二〇

七、作者觀在漢代的發展..... 二三

(1) 確定原本的學術路向..... 二四

(2) 探尋本義的解經傳統..... 二四